

中文版序

《紅色工程師的崛起》一書中文版即將問世，我甚感欣慰。書中所論述的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革，舉世矚目。中國讀者身處其中，理所當然對此更為關切。1949年中國共產黨掌權以後推行激進的社會平等計劃，1976年後又逐步實行市場經濟。這些變革，一直是中國國內爭論的話題。為了參與這場論戰，我撰寫了此書，現在很高興看到它將成為相關中文文獻的一部分。在本書英文版問世後的七年間，中國發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變化。最為突出的，即是由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的執政。習近平在清華大學學習過工程，他這一代領導人在眾多方面延續了技術專家治國的體制(technocratic regime)，本書詳細回溯了這個體制崛起的過程。但是，該體制的性質也在不斷演變。自1992至2012這二十年間，是紅色工程師治國體制最典型的階段。這一時期中共第三代、第四代領導治理國家，他們都是由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工科院校培訓出來的精英；在那個年代，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首抓物質建設和資源分配。朱鎔基與胡錦濤都是清華的工科畢業生，也是這兩代中共領導人中技術專家的代表人物。這兩代領袖領導了中國從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向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轉型，這一轉型也推動了技術官員在成員構成上的轉變。雖然習近平及其許多第五代的同事受過工科培訓，但他們現在越來越多地與受過經濟學、管理學、法學培訓的領袖們分享舞臺，這些學科與中共目前主導的國家資本主義類型更為一致。然而，這一轉變並未減弱該政權技術專家治國的性質，也沒有降低清華大學的至尊聲望及地

位。清華新開辦的經濟管理學院和法學院正在培養政治精英的新梯隊。事實上，本書中我所命名、描述的學術及政治兩大選拔認證體系（即精英院校的等級制和黨的選拔、晉升機制），還在繼續完善、深化。它們是中國技術專家治國制度的基石。

市場化、私有化和經濟兩極化正深切地改變著中國社會，日久天長，這些變化將有可能侵蝕中共政權「技術專家治國」的性質。有兩種特別的威脅應被指出：腐敗與民粹主義。一方面，旨在贏利的企業——公有的及私有的——正運用著日益強大的勢力，使具有技術專家性質的領導層及相關規則屈從於它們金錢上的狹隘利益。另一方面，財富及權力的日益集中，特別是兩者之間更為讓人震驚的聯繫，必然激起民眾的義憤，並隨之激發民眾爭取共享、爭取公正的要求。中共領袖們可以選擇抵禦或遷就這些壓力，但無論怎麼選擇，他們將最終改變政權及現存制度的性質。

有很多人為本書中文版出版而盡力。首先，我必須感謝何大明的精彩翻譯，由於英文原版中包含有許多長且複雜的句子，使得翻譯一事頗具挑戰性。最終，他創造出一個生動的中文譯本，既反映出他本人對中文的嫻熟把握，也展示了他對書中描述的鮮明獨特時代的熟知。其次，我必須感謝董一格為修飾最後稿本那才華橫溢及不辭辛勞的工作。我也感謝楊婷婷花費很多時間去翻查原始資料，來復原最初的中文術語及引語。我也深深地感激我的同事蔡欣怡 (Kellee Tsai)，她不僅為英文本成稿提供了寶貴的幫助，也向我引薦何大明而大大便利了中文翻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們熟練地完成了此版本的出版，創造出精美製作的書籍。本書能夠躋身於中文大學出版社繁茂壯觀的30/30叢書之林，我很自豪。

安舟

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

2016年1月

序

1997年我第一次訪問清華大學，目的是要了解三十年前文化革命中在那裏發生的武鬥。我已經聽說了清華大學兩派學生之間的「百日戰爭」，並且知道其中一派由蒯大富領導，他是清華大學的學生，其名字已經成了當時造反精神的同義詞。我對文化革命的好奇心，是由對1949年革命以來，中國階級結構改造這一更大的興趣所激發的，但漸漸地隨著我對清華大學教職員工和校友採訪的深入，我發現清華除了是文化革命中武鬥的重要場所，幾十年間，還一直是一些衝突的震中；這些衝突圍繞著一個技術專家官僚的新階級的出現而起。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清華——作為中國第一名的工程技術大學——一直承擔著培養「紅色工程師」的任務。技術官僚治國的觀點在清華大學中盛行，而且學生們相信，他們將把國家改造成一個工業化的社會主義共和國。但這些觀點一直是受爭議的。它們與中共致力消滅階級差別（包括那些基於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異的差別）的綱領性信仰是不一致的；而且，對於大多數中共幹部來說，這些知識精英是異己；那些中共幹部是農民革命家，他們歌頌與讚美產生於農村戰爭的那些傳統，心中深深地不信任知識精英。在文化大革命中，這些醞釀已久的緊張關係達到頂點。清華大學成了聲名遠揚的靶子，而且在派性武鬥被鎮壓下去後，毛澤東派遣工人和軍人到大學來，賦予他們消滅精英教育和防止學校變成「官僚階級」溫床的重任。在將近十年的時間裏，清華校園成了試行激進教育及管理的著名場所。在毛澤東死後，文革的激進政策遭到

拋棄，清華大學成為培養技術過硬、政治可靠的幹部的最高級機構；而這樣的紅專幹部是新政權所需要的，這個新政權已經寄希望於由技術專家治理中國的未來。清華大學的畢業生很快登上了黨和國家層級體制的頂端。

我所採訪的對象大多數都在清華大學待了幾十年，最初是作為學生，然後是教授或管理者，他們親歷了這段動盪歷史的大部分階段。我逐漸明白下面這個事實：清華大學一直是一些關鍵衝突的中心，而所有這些衝突最終產生了一個由技術官僚治國的秩序。因此，我認識到從基礎層面密切審視這所機構歷史的價值——在這裏，政策得以實施，社會關係得到改造。這就是我對中國的技術官僚階級起源的調查，為何以清華大學為中心進行的原因。最終我不僅對如今統治中國的技術官僚的起源感興趣，也對二十世紀共產主義實驗的命運感興趣，清華大學在我的研究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在對中國第一的這所工程大學的描述中，我努力捕捉掌權的共產主義政權軌跡的關鍵要素，開始時，它從事著一項激進的社會平等工程，結束時，它卻成了一個巨大的官僚政治事業，有著精心打造的社會等級制度。

我很幸運，清華大學是一個相當開放的地方。校園的公寓區裏，滿是願意與我分享其經歷與看法的人（在職的與退休的）；學校的圖書館裏，滿是提供該校豐富歷史文獻的材料。我在清華大學總共呆了二十個月，主要是在1997至2001年間，從回憶的及當時同期的資料來源蒐集數據。最重要的回顧性資料的來源，是對近一百人的採訪，他們是畢業生、教師、職員、工人和管理者（採訪對象的名單在書後的附錄2中）；我從各種各樣社會出身以及不同政治觀點的人士中尋求受訪者。已發表的回顧性資料來源，包括回憶錄、名教授及校領導的傳記、彙編有歷史數據的學校公報，還有官方及半官方的校史。我還參考了有關清華校史的學術著作和文章。文革同期的資料來源，則包括官方校報及校刊，由對立的學生派別發行的報紙及小冊子，在全國報刊上發表的有關清華的文章，還有清華印行的統計年報、管理總結及政治報告。我還從美國及中國的圖書館（包括清華大學及其附中的圖書館）、清華大學檔案館、舊書市場，以及受訪者及他人的個人收藏中獲取了文獻。

所有的描述——回顧性的及同期的、口頭的及書面的（包括官方文獻中記錄的統計數字）——都反映了其製作者及時代的偏見。同期的及回顧性的資料來源，各有著能夠互補的強項及弱點。在中國，公開表達從來都受到主導意識形態和政治考慮的限制。在中共掌權的前幾十年裏，不協調一致的政治辯論只在兩個短暫的階段成為可能：1957年黨的整風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早期；即使在那時，雖然辯論中有尖銳的爭議，它們通常還是停留在狹窄的政治界限之內。另一方面，這些材料記錄了當時的政治論調，從某個階段當時的觀點來闡釋事件。而用回顧的方法獲取的數據——諸如採訪、回憶錄及歷史——則免除了過去的限制及鼓動，但又要受制於其他的制約及誤導。再說，對於那些在幾十年深遠的社會變革之後的個人追憶，也得謹慎地加以處理。過去事件、動機及觀點的回憶，不僅隨著時間褪色，而且隨著以後的事件、政治及意識形態變化（官方的、集體的及個人的）留下各自的印記，它們也經歷了一個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變質及變形。因此，我小心地比較了多種多樣的來源，以重構歷史事件，包括激活它們的那些有爭議的觀點。集中關注單一的一所學校有一個優勢，那就是有可能考察針對同一事件的多種不同看法。

本書的寫作長達十年以上，多年來，許許多多人助我良多，我無法在此一一指出。我特別感激所有那些花費了時間給我講述其故事的人士。許多人慷慨地用了數小時甚至幾天來詳細講述他們對事件的理解，而且有些人尋找照片及文獻來說明他們的觀點。（除了蒯大富，我在此書中都沒有使用他們的真名。）清華大學教育研究所為我的研究，不僅提供了可靠的信息及訪談來源，也提供了一個舒適的辦公室。我特別想感激王曉陽和王孫禹，當我在該所時，他們是我的東道主。所裏和大學其他機構的圖書館員及檔案員，在尋找材料上，都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唐少傑曾花費多年研究清華的文革，他第一個鼓勵我把清華大學當作一個研究場所，我從他的研究以及我們兩人多年的談話中獲益多多。我特別從三個人的幫助和智慧中受益，他們是戴建中、武彩霞和徐海亮，他們參加過文化大革命，並花費多年時間，根據隨後的事件來調查及重新考慮那個時代的事件。他們慷慨地給我提供了許多文獻，每個人

在我的理解形成的過程中（雖然他們都並非同意我的闡釋）中都起到重要的作用。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蕭慶平（Richard Siao）和王友琴也提供了其他途徑無法得到的重要文獻。

我之所以能形成對革命後中國權力階層發展的研究方法，特別是因為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指導老師及同事的指導。我從羅傑斯·布魯貝克（Rogers Brubaker）和邁克爾·曼（Michael Mann）那裏學到了很多東西，他們提供了榜樣，教我如何從社會學的角度來學習歷史，並持續不斷地提供卓有遠見的建議。伊萬·塞勒尼（Ivan Szelenyi）的影響特別明顯，他指導我朝向多重類型的資本及相爭鬥的精英的概念框架前進，而且，他的工作對我自己的是一個充滿智慧的借鑒。Rebecca Emigh、黃宗智、William Roy、申起旭（Gi-Wook Shin）、唐啟明（Donald Treiman），和閻雲翔都提供了極有價值的意見。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羅伯特·布倫納（Robert Brenner）、陳小珊（Susanne Chan）、Eileen Cheng、Steven Day、杜克雷（Clayton Dube）、Jon Fox、郭貞娣（Margaret Kuo）、Mara Loveman、Mark Luper、孟悅、Dylan Riley、宋時歌、Elizabeth VanderVen、王超華、吳盛青和吳曉剛等閱讀了我此書許多章節或論文的草稿，並給了我有益的建議。我特別感謝叢小平的幫助，她除了閱讀草稿，還幫我分析文獻資料，以她自己的經歷提供洞見。

多年來，許多別的人在寫作的各階段為此書各部分也提供了有價值的評論、批評和建議，他們是崔之元、德里克（Arif Dirlik）、陽和平、周錫瑞（Joseph Esherick）、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韓東屏、任柯安（Andrew Kipnis）、李路路、路愛國、白威廉（William Parish）、彭玉生、胡素珊（Suzanne Pepper）、方迪（Stephen Phillion）、畢克偉（Paul Pickowicz）、蘇黛瑞（Dorothy Solinger）、蘇陽、湯思奧（Saul Thomas）、田立為、安戈（Jonathan Unger）、魏昂德（Andrew Walder）、白霖（Lynn White）、武麗麗、吳一慶、嚴海蓉、印紅標、占少華、趙鼎新和鄭小威。

自從我到巴爾的摩以來，我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同事，包括Rina Agarwala、喬萬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韓嵩（Marta Hanson）、梅爾文·科恩（Mel Kohn）、梅爾清（Tobie Meyer-Fong）、羅威廉（William Rowe）、貝弗利·西爾弗（Beverly Silver）和蔡欣怡，幫我把此書收尾，提

供了有價值的建議和鼓勵。我特別感激蔡欣怡具有分析批評的支持及建議。在研究及編輯方面的幫助，我感謝 Laila Bushra、Angela Huang、黃伶俐、Li Meng、Li Yuyu、Sun Haitao、王穎曜和岳峯。

我之所以能夠在中國待很多月，是由於美國教育部、北京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的富布賴特—哈耶斯項目 (Fulbright-Hays program) 所提供的研究獎金。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斯賓塞基金會 (Spencer Foundation) 為寫作提供了支持。

當代亞太問題系列 (Contemporary Issue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series) 編輯部的成員及匿名的審稿者，通過激勵我加強自己的許多弱項，並對近期的發展增添更詳盡的分析，幫助我最後定稿。東西方中心 (East-West Center) 的 Elisa Johnston 和斯坦福大學出版社的 Stacy Wagner 從初稿到審校樣，為指導本書做出了出色的工作。

最後，我想感謝 Peter Andreas，他既是我堅強的弟弟，又一直是我在學術世界裏主要的輔導老師；還有我的妻子 Ay Vinikul，她在完成此書的漫長過程中，既是我的伴侶，又是最重要的支持者；隨著這本書的最終完成，她將和我一樣幸福快樂。

安舟

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

2008年4月